

# 解读



## 郁达夫 经典

程光炜 主编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山东师范大学

上海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

著名专家学者

领衔编写

少年图书馆协会

丛书主编

丛书顾问

严家炎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谢冕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洪子诚 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花山文艺出版社



青少年图书馆丛书

丛书主编：程光炜

# 解 读

## 郁达夫

# 经 典

主 编：程光炜  
撰 稿：程光炜

花山文艺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解读郁达夫经典 / 郁达夫原著 ; 程光炜主编 . —石家庄 : 花山文艺出版社 , 2003  
(青少年图书馆丛书 / 程光炜主编)  
ISBN 7 - 80673 - 352 - 3

I. 解 ... II. ①郁 ... ②程 ... III. 郁达夫 (1896 ~ 1945) - 文学欣赏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0308 号

---

丛书名：青少年图书馆丛书

书 名：解读郁达夫经典

---

原 著：郁达夫

丛书主编：程光炜

主 编：程光炜

撰 稿：程光炜

责任编辑：阎 丽

责任校对：王世卿

美术编辑：宋丕胜

封面设计：天津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花山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050071)

(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

网 址：<http://www.hspul.com>

E - mail：[hswycbs@heinfo.net](mailto:hswycbs@heinfo.net)

印 刷：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212 千字

印 张：8.625

印 数：1 - 3,000

版 次：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 - 80673 - 352 - 3 / I · 214

定 价：11.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 青少年图书馆丛书编委会

严家炎 谢冕 洪子诚 程光炜 孔庆东 旷新年 刘勇 吴义勤 王兆胜 王光东 张健 张新颖

### 顾 问

严家炎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谢冕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洪子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 主 编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	----------	-------

### 编 委

(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程光炜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孔庆东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旷新年	清华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刘 勇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吴义勤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王兆胜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审	文学博士
王光东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硕士生导师
张 健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张新颖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硕士生导师

## 主编说明

本丛书所选 10 位中国现代文学著名作家的作品，主要发表在五四至 1949 年这段时间。由于历史原因，他们的创作风格和行文方式与当代文学有很大不同，很多在今天看来有“问题”的语句，在当时实际都是非常流行和通用的，带有那个时代文学语言的鲜明特征。为了便于青少年读者了解 20 至 40 年代文学的语言风格和个人文字魅力，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对上述作家的作品忠实历史原貌，除对个别文字及标点符号作了变动外，其余均一仍其旧，未作修订和校注，特此说明。

程光炜

2003 年 9 月

## 总序

程光炜

如果从 1917 年算起，中国现代文学已经有了 85 年的历史。之所以人们习惯将 1917—1949 看做现代文学的“30 年”，是因为那是一个大家、名家辈出的时代，而这一群星灿烂的情景，在近一个世纪的中国文学中并不多见。虽然，在“文学”和“历史”的天平上，重量是倾斜于“历史”的，文学无可置疑只是历史的一部分。然而，文学却用自己的方式展现历史宏大的场景及其丰富和充满矛盾的内涵，暴露出被时间掩埋的某些不便言传的细节，从而把历史的声音、形象储藏在诗歌、小说、戏剧和散文之中，变成一种特殊的民族记忆。所以，当历史远走之后，留给“今天”的，往往是一些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那些不会“远走”的作品。我想，这也许正是我们编选丛书的一个初衷。

丛书所选的 10 位作家，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时期的创作成就，他们各不相同的艺术风格，显示出这一时期文学极其丰富、多样的审美形态。由于“背景”、“地域”和“人生经历”等等的不同，他们的创作所存在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因为复杂的原因，文学史、包括读者对这些作家的“评价”与他们的实际成就并不一致，有些，甚至远离了他们创作的实际状况和史实。上个世纪 90 年代以后，许多作家的“位次”又出现了一些调整，他们的“身份”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变化。但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因为，“当代人”总是按照

自己时代的价值取向和审美习惯来“挑选”作家的，他们的“文学接受”难免要打上“时代”的特殊印记。鉴于上述大的文化动向，进入我国中学课本的作家，在不同时期想必也会发生相似的“变动”和“调整”。比如，在50年代至80年代的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郭沫若、朱自清、茅盾、巴金、老舍的作品占有较大的比重，鲁迅则是每书必选的作家之一。90年代后，这种格局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过去一直被忽视、甚至不曾露面的作家，例如沈从文、梁实秋、林语堂、张爱玲等人这时纷纷“登堂入室”，他们的作品不仅占去了“主流作家”长期占有的篇幅，而且愈益“抢眼”，开始拥有比较多的读者。当然，如上所说，这种情况是“时代”在另一情景下的又一“选择”，人们大可不必为之奇怪。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任何文学选本，都能对当时的读者，尤其是中学生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留下特殊的“文学记忆”。文学在一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有时候会起到别的书写形式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一事实，已经被几十年来我国中学教育的历史所证实。考虑到这一情况，各位编选者力图避免过去那种“倾向性”的编撰习惯，尽量选入既代表一个作家最高成就，又反映出他们创作态度和艺术风格多样性的作品，无意再像以前那样“主观地”去影响、左右读者，而是给后者留下了更大、更宽阔的选择的空间，让他们按自己的眼光来挑选作家，欣赏作品。

80年代以来，我国的现代教育进入了繁荣的时期。更多的青年学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到大学深造的梦想。但是，由于“升学”、“就业”等社会问题带来的压力，中学教育中也出现了“本末倒置”的现象。高分低能，一定意义上降低了一代人的文化素质，而这种积重难返的现象，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身上表现非常明显。从更长远的眼光看，它的“累积”，不仅将会极大地影响到大学阶段的教育质量，使民族的人文教育进入一个



“低谷”，而且其负面效应，也许是无法估价的。其实，现在不光不少理工科学生在文学知识、修养上近乎“文盲”，即使有些文科生、甚至中文系学生，四年之中没有通读过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子夜》、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离婚》等作品的，也不算是什么“新闻”。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急功近利的中学课堂教学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与我国目前大学体制“非人文化”的状况有直接关系。说到底，高中课堂的语文教学实际是一种“文学教育”，“语文教学”在本义上，不单要求学生掌握基础性的、必要的“知识”，以便适应高考，还要求学生是一个有相当文学修养和艺术鉴赏能力的人。尤其是后者，某种程度上成为一所学校和老师的教学是否成功的一项重要标准。然而，实际的情况是，这种“判断标准”与现实状况恰好相反，有些，甚至到了令人堪忧的程度。今天看来，上世纪初蔡元培先生提出的对国民进行“美育”的思想的确是非常高瞻远瞩的一种识见，但显然，蔡先生所说的“美育”并不等于是“课堂教学”，它包括的范围，远远要比人们的理解更加广泛。因此，在我看来，所谓的“文学教育”是在课堂之外由学生自我完成的，它与“课堂”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要比课堂站得更高、也更远大和丰富。文学教育牵涉到学生本人的阅读、欣赏、选择等等一些方面，它是以广泛的文学阅读为基础的，是一个不断累积和储蓄的过程，只有在读了很多的作品之后，他才能真正了解一个作家的创作个性，其精神世界和作品之间的复杂关联，从而才能对同类作家和一个时期文学的总体状况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体察和认识。“十年磨一剑”是一个现实比喻，然而，文学修养其实就是一个长期为之、坚持不懈的过程。同样道理，一个首先具备了深厚的文学修养的人，他才有可能在知识的竞争中始终处于较大的优势。

本丛书聘请了国内几位有声望的学者担任顾问，他们是：北

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严家炎先生、谢冕先生和洪子诚先生。各位编选者，都是目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青年翘楚，如孔庆东、旷新年、刘勇、张健、张新颖、王兆胜、吴义勤、王光东等，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等一些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另外，一些硕士、博士研究生也参与了部分篇目赏析文章的撰写工作，他们的“加盟”，为本丛书增添了不少亮色。值得提到的是，各书作品篇目的选择、书前导言及赏析文章，反映了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的研究水平，它们不光视野开阔，知识结构新颖，而且也注意在“作品赏析”之外，详细介绍作品产生的“背景”和其它相关知识，充分体现了当代性、青年性、知识性和新鲜活泼的编选风格。入选的篇目，有些已经与目前的中学语文课本相连接，有些作品很少见到，有些则超出了课本范围，力图使读者在掌握基本的知识之外，有一个比较开阔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艺术视野，使他们能够站在一个较高的台阶上俯瞰中国现代文学的全貌和发展历程。另外，在赏析文章的撰写上，我们要求做到艺术感好、叙述新颖、有较强的分析能力，要求文字上尽量贴近高中生的欣赏口味，同时做一点适度的提升。要求它们好读、耐看，有吸引力，同时像一篇知识性的美文。如果说，读者与作品之间是一种交流的关系，那么编选者、赏析作者与读者之间，也应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的关系。相信通过这套丛书，广大青少年读者能和我们一起进入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当中，产生一种真正的心灵和艺术的对话。

最后，我特别要向几位担任顾问的学界前辈，向各位编选者和参与撰写工作的研究生们，表示衷心的谢忱。



## 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开山者

程光炜

郁达夫是以专情而放任的矛盾形象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他个人的情感经历，充满传奇、怪诞和自我中心的色彩，带有五四那代人的心灵轨迹，曾是媒体的炒作热点，更是当时书商热烈追逐的对象。他客死南洋本身就是一个谜，但他个人生活所具有的神秘形态，也因为战争阻隔、音讯的断绝和个人文字的缺失而成为一个永远的悬案。当然，这或者可以说是郁达夫的个人魅力——一个崇尚个性的现代文人，社会的多余人。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他出生在一个衰落的世家，父亲早亡，身边只有母亲和一个丫环。破败的家世和体弱的身躯，养成了他内心忧郁与躁动不安相交杂的性格。他中学就读于著名的杭州府中学。1913年东渡日本，1922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其间与郭沫若发起成立创造社，为该社的重要作家之一。1926年，因与创造社成员意见相左而宣布退出。两年后，与鲁迅合编《奔流》，并过从甚密。1930年加入左联，不久又退出。抗战爆发后，他辗转马来西亚、新加坡一带，做过报刊编辑和其他职业，1945年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郁达夫早年有过婚姻经历，与王映霞相遇后，离异后与王结合。为此，他记录这段“苦恋”的日记出版后，曾是沪上的一大新闻，被广为传布。他与王映霞因性格不合闹得沸沸扬扬，他之远赴南洋，与这一感情风波有直接的关系。两人分手后，据说郁达夫又与南洋一当地土著秘密结合，但时间不长。

在现代文坛，郁达夫是以惊世骇俗的“自我暴露”小说而闻名遐迩的。1921年，他的短篇小说集《沉沦》作为“创造社丛书”之一在上海出版。《沉沦》收《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它们以大致相同的叙事视角展现了“零余者”的畸形心理和性压抑的心态。这些小说对主人公性心理的大胆暴露，对传统道德构成了猛烈的攻击，出版后，在传统读者界和新文学所受到的截然不同的“待遇”是不出人们的意料的。《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由此也形成了他小说创作的“言说方式”。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留学日本、形单影只的男青年，他们神经过敏、脆弱多疑，饱受贫穷、孤单和性苦闷的折磨而不能自拔。他们期待得到女性的爱，但追求方式多以幻觉、梦想的怪异形态表现出来，这些感觉与自卑相混杂，又扭结为变态和出格的特点。同时，这种极具个人性的心理挫败又与爱国、民族自尊等宏大叙事结合了起来，从而形成既与留学生文学潮流合流，又带有作家“自叙传”的鲜明色彩。

在现代文坛，以记录个人生活为背景的“自叙传”抒情小说是郁达夫开启先河的，在他之后，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小小的“传统”。虽然这一传统在后来的发展中几遇曲折而发生多次变异，但其基本叙事框架和抒情方式，却都与郁达夫有这样那样的内在联系。这种“自叙传”小说较多地接受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同时又吸收了20世纪初风行于日本的“私小说”的创作手法，并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造，主要是呈现作家自己的身边生活，减少对外部社会的依赖，而偏重于作家个人私生活——尤其是灵与肉的冲突中的性变态等等。我们注意到，在郁达夫的创作中，他总是以第一人称写“我”，如《青烟》、《薄奠》、《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等，或者采用第三人称“他”，但实际是作者自己的影子，如《沉沦》、《银灰色的死》、《采石矶》、《南迁》、《茫茫夜》等。除了少量小说，其他大部分小说都直接取材于他自己的经历、遭遇和心情，与其生活道路和事件基本处在相互叠合的状态。但这种“自叙传”



小说并不等于自传，正如郁达夫所公开表白的，而是想“赤裸裸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便社会读者“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因此，他的小说并不谋求曲折的情节、细致入微和周到的构思，注重表现个人情绪的起伏变化和心理的流动，依靠激情和才气一路写去。他只求情感的真切和坦率，于是，直抒胸臆是最常见的手法，在事件的叙述中做大胆的自我解剖，乃至用长篇独白去直接触动读者的心弦，即使结构松散、粗糙也在所不惜。如《沉沦》用激动的、跳跃性的语言，直接展现主人公的心理活动，作品的结构完全服从他的情绪的变动。《南迁》围绕两个女人的爱，以赤裸裸的笔法交代了主人公内心极端的苦闷、惆怅和行为上的怪诞。由于郁达夫的个人身世和情绪折射，与五四退潮后青年一代普遍存在的精神苦闷和婚恋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他大胆的自我暴露宣泄了后者压抑的情感，所以，造成了当时的“郁达夫热”。

强烈的主观抒情，是郁达夫小说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传统的小说，依赖故事的完整、叙述的流畅和贯穿如一，情节是其叙事功能的基本框架。郁达夫的小说，完全改变了传统小说的审美特征，而将主情主义的审美意识和手法拉进了小说。他曾这样理解小说，说“人感到了痛苦，不得不叫一声一样，又那能顾得这叫出来的一声，是低音还是高音？”这种小说观念，当然对传统小说构成了极大的冲击。因此，他的小说叙述基本是由独白式的抒情话语组成的，他的叙述目的，只要使读者在“情调”上受了感染，而且感受到作品的“氛围”就行。更由于这种强烈的抒情所导致的叙述结构的散文化的特点，作者对故事的叙述，不是以主人公的眼睛去“看”，而是以主人公的心灵去“体验”来推进的，也就是说，作者、叙述者和主人公三者之间消弥了“叙事距离”，变成了高度统一的东西。所以，小说所展示的一切场景、冲突和细节，都带着主人公浓厚的主观色彩，读者在作品中直接感受的，不是故事，而是主人公强烈的情绪冲击和包围。

与之相应的，是他小说大胆的自我暴露。在郁达夫之前，现代小说家中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小说中如此真率地暴露过自己。但是，除了上面所说，他的“自我暴露”一部分来自其个人生活外，还有许多与虚构有关。即是说，郁达夫通过自己犀利的笔，把五四一代人在破坏旧世界过程对个性解放和自由的大胆想象，以非常极端的形式宣泄了出来。他的“自我暴露”，既是作家个人的自供状，也是五四一代人的自供状。郁达夫小说的意义，即是他说出了别人不敢说，道出了别人不敢道的心灵深处的苦闷和压抑而已。也许因为如此，这种大胆的暴露中同时也带有主人公的病态心理。郁达夫小说的主人公，都是有着严重忧郁症的“零余者”。或者说，他们大多是现实与幻想、异国与故国、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夹缝中生存和思考着的。一方面，风气的大开，使他们接受了西方民主、自由的个人理念；另一方面，国内社会的黑暗、腐败又使他们的抱负无处伸展。一方面，他们远涉重洋，去国外寻求知识和真理；另一方面，所在国的歧视和屈辱，使他们常常陷入压抑、苦闷之中。郁达夫将主人公置于一种自卑、扭曲的心灵状态中，以夸张的病态心理的描写，表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痛苦。他对人物病态心理的揭示，主要是通过被压抑的生命本能的宣泄和转移，具体地说，就是“哭穷”“哭性”的特异方式和情绪基调来进行的。正因为如此，郁达夫对人物病态心理的暴露，成为五四文学中对旧礼教的最大胆的抗议之一，和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最耀眼的亮点。

30年代后，郁达夫的小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大写的“自我”逐渐从作品中淡出，主观的情绪描写开始为客观、平实的叙述所代替。愤世嫉俗的态度不再是小说的支配力量，而焦虑的心态也自觉地向着通脱的方面发展。另外，作家也注意留心故事的完整和传奇性，叙述手法有向传统小说转移、靠拢的迹象。《迟桂花》一改前期小说穷愁潦倒的压抑气氛，在读者面前，出现了山间和谐、宁静的宜人景象，“我”对女主人的追求也不再像以前那么赤裸裸的、毫无

遮拦，而变得有几分羞涩起来。最后，两人战胜了情欲的诱惑，走出人性的困境，一种兄妹式的纯洁关系使整个小说走向了高潮，它与周围大自然的整体格调显得是那么和谐。《过去》几乎就是一篇忏悔小说了。它起因于人的欲念，结束于人的超越，使读者在异常纯净的氛围中看到了小说的谢幕。小说写“我”在南省的海边，偶尔与两三年前相熟的上海四姐妹中的老三相遇。波涛汹涌，海阔天高，“我”不禁触景生情，对这位原来不曾留心的老三产生了欲念。但是，几次会面后，他才发现，老三爱的原来是“过去”的那个自己，他的游戏态度竟然变得非常萎缩起来。于是，在蓝天碧海的衬托下，主人公终于走出了人生的陷阱，心境顿然变得宽豁、阔大起来。但是，读者当会留意，尽管作家后期创作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然而其小说叙述结构和人物关系并没有超出原先的模式。郁达夫的小说不仅继续在道德观念上对传统意识进行解构，而且还从宗教的角度深入探讨了人生的崭新意义，从而把他开创的“自叙传”的浪漫抒情小说引向了一个新的天地。

#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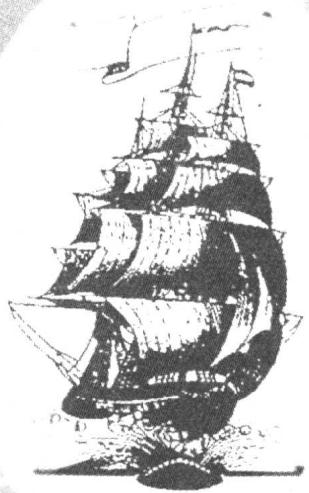
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开山者 程光炜 1

## 第一辑 个人的抒情

沉沦	3
银灰色的死	38
南迁	53
采石矶	96

## 第二辑 忏悔之作

迷羊	119
春风沉醉的晚上	201
迟桂花	216
过去	247



---

**第一辑**  
**个人的抒情**

